

1916-1999



Benjamin I. Schwartz
An Academic Chronicle

史华慈学谱

朱政惠 编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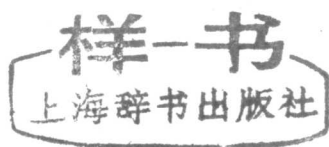
1916-1999



Benjamin I. Schwartz
An Academic Chronicle

史华慈学谱

朱政惠 编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华慈学谱 / 朱政惠编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ISBN 7 - 5326 - 2173 - 1

I. 史... II. 朱... III. 史华慈(1916~1999) —
年谱 IV. K837.1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3110 号

出版人 张晓敏
责任编辑 余 岚 李 纳
装帧设计 汪 溪

史华慈学谱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www.ewen.cc www.cihai.com.cn

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5.75 插页 2 字数 282 000

2006年12月第1版 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 - 5326 - 2173 - 1/K · 399

定价: 4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55032807

作者简介

朱政惠，男，江苏江宁人。历史学博士。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终身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教研室主任、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委员会委员。社会兼职有：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国家文科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世界中国学论坛”专家委员会委员、《海外中国学评论》主编。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学史、史学理论、海外中国学史等方向的学术研究。著有《美国中国学史研究——海外中国学探索的理论与实践》等专著。

谨以此书纪念

本杰明·I·史华慈诞辰九十周年

怀念史华慈*

(美) 柯文、默尔·戈德曼、麦克法夸尔**

20世纪50年代早期到90年代晚期的40多年来,通过在哈佛大学政府与历史系的教学工作,以及其著作与论文,史华慈成为中国研究领域内的泰斗级人物。他的研究,尤其是在横跨思想史与政治学的领域,已成为衡量学术的标准,他的研究对于学生们以及全世界的学者们都具有指导作用,而且已成为学人们获取灵感的来源。他的影响超出了中国研究领域,也超越了约定俗成的学科分界,涉及政治学、宗教学、哲学、文化与文学,还有历史学。

史华慈学识广博,甚至远远超出他能读或说的十种语言所包括的文化。在课堂上,他拒绝让自己局限于现有的话题。因此,与他一同教学,就无异于参与一场生动活泼但又总是带有大学色彩的对话。在讲授时,他决不将他的学术看作是一套固定的真理或者是简单地增加信息量,而是以独特的路径引导听众进入提问的状态。这一路径的核心要点是,对于已为人们接受的真理、以预测为中心的解釋模型(例如政治学的、经济学的体系)、日常学术话语中的陈词滥调、无论以哪一种形式出现的还原主义都持有健康的怀疑态度。史华慈一再坚持认为,要对人们以为是不证自明的内容进行重新的界定,揭示并打开隐藏在简单标签背后的复杂性。例如,在他的论文《论社会选择的领域》之中,他断言,我们之所以难以把握当今的

* 本文原载《中国季刊》2000年3月号(第161期),应笔者请求,作者同意将这篇文章刊载于拙著。柯文教授还特地帮我征求了《中国季刊》(剑桥大学出版社)编辑部的同意。编辑部罗斯·珀尔格里尼(Ruth Pellegrini)代表林达·尼可力(Linda Nicol)发出了授权函。文章的中文译本依据《世界汉学》第2期的底本。特向所有给予帮助的学者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笔者

** 柯文(Paul A. Cohen)、默尔·戈德曼(Merle Goldman)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为哈佛大学教授。

社会思想,与其说困难来自各种新术语,还不如说来自于陈旧的已经确立了的术语,通常我们都以为它们是显而易见的。诸如此类的术语“社会的”、“社会”、“系统”和“选择”,其意义看似清澈透明,然而在它们当中埋藏着当人类科学的所有难题与两难困境。

史华慈是一个充满悖论与古怪对立面的人,因而他不太容易被归入学者——思想家的行列。他曾经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写过开创性的著作与论文。直至今日,《中国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1951)不仅仅在共产主义运动比较研究领域,而且在政治史与思想史领域,也仍然是先驱性的研究。在特别复杂的政治、个人、国际语境之中,他分析了20世纪20年代早期几十年中发生的意识形态争论与思想争论。他第一个通过数量巨大的文献,向人们揭示中国共产党人决不仅仅是斯大林与苏联的傀儡,而具有他们自己的办事主见。像毛泽东这样的领袖人物随时都会与莫斯科决裂,只要它的秩序与他所认为的中国实际发生碰撞。他的第二本书《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1964),将注意力集中于晚清主要的思想家严复,他对西方社会政治思想的翻译在当时有极大的影响。史华慈对于严复的分析解释了一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所作的抗争,这种抗争为的是对付因与西方发生了政治与思想文化冲突而导致的紧张关系。他的第三本具有突破意义的著作是《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1985),书中对中国古代的政治观与权力观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通过与其他文明(尤其是与西方早期文明)的基础观念进行频繁的比较而予以阐明。

从气质上讲,史华慈不愿意使自己因为职业身份而局限于成为一名“中国问题专家”。他经常参与更广泛的思想文化讨论,例如,他对阿伦·布鲁姆(Allan Bloom)的猛烈批评美国高等教育的畅销书作出了反应;此外,他对汉娜·阿伦特在她的“政治宗教”中对犹太人与犹太教所作的处理进行了研究性的批评。他经常表现出捍卫“区域研究方法”的热情,因为这种方法具有一个没有公开说明的特点,即它重视文化的决定作用,尽管如此,他却立场一贯地表达他本人的信念:相信超越文化阻隔的人类公共文化共同体是存在的。最令人惊异的是,权力的运作,对其根源的探求,道德的流衍以及其他的一些论题,都令他长期着迷、执着地探寻,这是最令人吃惊的。然而,要想找到任何比史华慈对于个人权力看得更淡的人,恐怕也是不容易的。

史华慈以前的学生曾经在1990年为他出版了一本纪念论文集《跨越文化的思想观念》。在他所获得的荣誉之中,他担任过美国亚洲协会的主席(1979—1980)、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主任(1983—1984)。他那本论中国古代思想的著作获得过

PhiBeta Kappa 学会的爱默生奖。此外,还赢得了美国历史学会的 James Henry Breasted 奖。1998 年,他又获得美国历史学会杰出学术奖。

尽管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他身体衰弱,但始终目光炯炯,思考能力丝毫不减。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他的到场仍然能够令任何讨论从琐碎平庸的层次朝思想道德的深刻层面提升。尽管他对犹太宗教浸入甚深,但他对于世界上所有的思想方式(佛教、儒家、中国民间宗教、哲学性道家、伊斯兰教、基督教)都有深入的欣赏与理智上的理解。他还有一种非凡的能力,能抓住思想争论中的核心问题,不论问题是多么地混乱或深奥。就在他临去世前几个礼拜,在费正清中心的讨论会上,人们讨论一个问题:中国革命是否有其必要性?通过对问题的前提进行发问,史华慈以其特有的方式挑明了整个问题。他断言说:问题不应当是,是否那场中国革命有其必然性;问题应该是,任何一场革命是否有其必要性。通过这一表述,他引导我们去思考更为深层的问题,转化了这场争论。

史华慈的去世,不仅仅是思想界的重大损失,而且也是人格资源上的重大损失。正如鲍姆(Richard Baum)在其他地方说过的那样,他是“一位真正的绅士”。他对人一视同仁,不论你年长还是年少,是学生还是政治家,是他每天都用葡萄牙语打招呼的费正清中心的厨房职员还是高级访问学者,他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因为他能够与每个人一起加入到同一个思想话语之中,从每一个人身上,他都能学到东西。他是一人格魅力与思想魅力都同样杰出的人,这样的人物真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前 言*

朱政惠

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美国当代著名中国学家。1916年12月21日诞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东部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34年入哈佛大学深造,1938年毕业。1940年哈佛教育学院求学并获硕士学位。1942年入伍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同年9月到驻扎于华盛顿地区的美国通信兵情报部门工作。1945年被委派到日本工作。1946年从部队退伍,再度进哈佛深造,攻读博士学位,转向东亚和中国问题研究。1950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

史华慈掌握12种语言,分别为英语、希伯来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日语、俄语、拉丁语、中文以及 Yiddish。^{〔1〕}长期以来,他一直是哈佛大学东亚和中国问题研究方向的学术负责人。曾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常务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美国亚洲协会1979—1980年度主席。他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成就赢得美国学术界的尊重,影响直逼“中国学之父”费正清。1998年1月,被美国历史学会授予“学者荣誉奖”,这是美国历史协会给予资深历史学家的最高荣誉。1999年11月14日,因病与世长辞,享年82岁。迄今为止,他的中国学研究遗产受到美国、中国和世界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学者对此的研究兴趣方兴未艾。

* 本文以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学刊》(2002年卷)发表的文章《史华慈的中国学研究》为底本作较大修改,在这里发表作代前言。

〔1〕 在访问史华慈夫人的过程中,因笔者请求,夫人具体回忆了史华慈所掌握语言的情况,并确认史华慈所掌握运用的语言为12种。

史华慈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

史华慈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著作主要有:《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1951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A Documentary of Chinese Communism),1952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与费正清等学者合作编选);《共产主义在中国:流变中的意识形态》(Communism and China: Ideology in Flux),1968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及其他》(China and Other Matters)等,1996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

史华慈对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最大特点,在于他对美国中共党史的开创意义的研究。他是美国学术界最早展开对中共发展史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专家。《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是他这一学术研究的代表作。这部专著包括14章,主要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其有影响的重要观点,就是认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苏联走的道路不一样,毛泽东的革命战略不是向莫斯科靠拢,中国人的胜利是靠自己打出来的。他不同意当时所谓中国人的革命受苏联人指使的说法。他在这本著作中写道,我的研究的结论就是,“毛泽东的政治战略并不是按照莫斯科的轨道设计的,甚至有点反其道而行之;当这样的战略确定的时候,莫斯科的思想还被认为是极其神圣的”。史华慈在这本著作中还分析说: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会有如此复杂关系的原因,在于其很不一样的历史因素。他写道,正如“传承于不同的历史因素一样,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还会影响他们现在和将来的进程”。〔2〕

史华慈关于中国不是莫斯科传声筒的意见,〔3〕是在中苏关系最好的时候讲的,也是在当时美国人中颇流行中国共产党受制于苏联控制的假设的情况下提出的,所以能作出这样的分析很不容易。现在,这个分析已被证明是有识见的理论探

〔1〕《中国及其他》(China and Other Matters)收入他多年来所撰写的论文18篇。涉及当代中国问题的理论文章主要有《中国人的理想和美国人的政策》、《论孝与革命》等。史华慈为这本论文集撰写了引言。

〔2〕 Benjamin I.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Introduction, p. 5.

〔3〕 1949年,史华慈撰写了题为《马克思、列宁在中国》一文,并在当时《远东观察》第15期发表。史华慈说,“根据自己的研究,可以斗胆预言,中国共产党人将追求自己的利益,他们不会做莫斯科的听写器”。

索和政治预见。史华慈的这一研究,实际上也为当时的美国提供了观察中国革命的最新分析和理论咨询。1949年新中国成立,很多西方人士有所准备,但总的说,还是对她缺乏了解,尤其对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思想认识不充分。甚至觉得无法预计其对整个东方乃至世界的影响。史华慈的研究有助舒缓此方面的危机情况。拉铁摩尔、韦慕庭等有影响的中国学家都撰写书评,认为史华慈的著作对认识这个东方大国的革命是有益的,也是美国中共党史研究的开拓性著作。〔1〕

史华慈所以形成这样与众不同的见解,涉及其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他特别强调对于历史文献原本的阅读和研究,强调从文本中探求对历史真实面貌的看法。他对道听途说的东西从不轻信,凡事自己思考。〔2〕1952年哈佛大学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很可以体现他的这一研究特点。这本书由他和康瑞特·布兰特(Conrad Brandt)、费正清等学者共同主编。收集了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到1950年的40套重要文件。史华慈等学者在文集的引言中强调,研究中国问题,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要注意原始文本的研究;美国对中国革命估计有错误,之所以有错误,在于了解的情况不实在;虽然新闻记者和政治家们介绍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情况,但他们对实质性的历史事实知之甚少或者根本不知道;缺乏对中国革命基本事实了解的美国,又隔膜甚远,怎么会不犯错误?引言说,文集编辑的目的,就是要使美国当局和研究者能了解到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我们知道的情况应该与希腊戏剧中演员和合唱相似,“能够揭示实际的革命过程中的某些情况,领导人的计划和目的,他们的纲领和口号,战术和组织方法,一直到他们的最后胜利”。〔3〕

《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引言确定的这一研究方法,很快为学术界关注。有关评论当时就指出:“建立对于最近中国发展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解和认识,对于我

〔1〕 Owen Lattimore; *Review: Chinese and the Rise of Mao*,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ume 24, Issue 2 (Jun., 1952), p. 203. C. Martin Wilbur; *Review: Chinese and the Rise of Mao*, *New China: Three View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ume 57, Issue 3 (Apr., 1952), pp. 679 - 681. Max Beloff; *Review: Chinese and the Rise of Mao*,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ume 28, Issue 4 (Oct., 1952), pp. 535 - 536.

〔2〕 思考问题是史华慈从小养成的习惯。史华慈夫人本尼·史华慈曾接受笔者的访问,她向笔者介绍说,史华慈从小就养成思考问题的习惯,喜欢深入思考问题,不断“deep”,寻找Key。他从小爱读书,喜欢安静(“Quite”),所以亲友聚会,总要对他讲:“Ben, say something.”小时候曾经在拉丁学校学习6年,但并不喜欢拉丁学校的学习生活,因为那里的学习,主要是将拉丁文翻译成英文,将英文翻译成拉丁文。本尼说,“He hate it”。

〔3〕 Conrad Brandt, Benjamin I. Schwartz, John K. Fairbank: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Introduction. p. 12.

们是多么地重要。”《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对于我们理解共产党中国是个非常重要的贡献”。〔1〕

这部著作的引言、鸣谢词、结论，都没有说明引言具体是出自三位主编中谁的手笔，但据笔者了解，史华慈起了重要作用。这也是史华慈一贯的学术观点，贯穿他一生的研究方法。他不轻易相信别人的结论，也不轻易跟随什么思潮，“他最大特点就是相信文本，主张啃文本，从文本的研究中得出自己的结论。他的研究往往有突破性成功的原因也在这里”〔2〕，他的一些学生在研究中也很有注意老师的这一方法。〔3〕史华慈的这一思想和方法，在晚年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中有更实在的阐述。是书引言强调：“在文本和解释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永恒的辩证互动关系，因而任何解释的真诚的努力，都必然包含对于文本本身的深切关注”，他说：“我们必须仔细斟酌我们对于原始文本的理解，对于文本的关注反过来又必定会引起对于文本所由以出现的环境的关注。”〔4〕

《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的引言写道，纯粹从美国人的观点出发很难理解共产党中国，从中国人的具体情况出发又不是这样，然而美国在亚洲的政策任何进展又必须考虑这些因素〔5〕，这番话说明了史华慈等学者编撰文献的基本出发点。史华慈从美国对华政策的角度研究问题，体现了他的撰述背景和基本价值取向，这也是我们研究他的学术成果时应该注意的。

《共产主义在中国：流变中的意识形态》是《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出版后的又一本重要论著，收集了他从1954年到1967年间发表的论文，包括对中苏关系、中美关系、中国现代化、毛泽东思想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主要篇章有：《中苏争论的若干问题》、《中国人的理想和美国的政策》、《现代化和毛主义者的理想》等。诚然，史华慈的立场和中国共产党的想法会有很多原则上的不同，但史华慈对

〔1〕 Leonard Constantine: *Review: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Pacific Affairs*, Volume 26, Issue 2 (June, 1953), pp. 167 - 169; Franz Michael: *Review: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ume 12, Issue 3 (May, 1953), pp. 352 - 355.

〔2〕 这是哈佛大学林同奇先生经常跟笔者说的话，他特别强调史华慈的这一研究特点。

〔3〕 参见徐雁平：《徘徊者和流浪者李欧梵》，《博览群书》1999年8月7日。

〔4〕 Benjamin I. Schwartz: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2.

〔5〕 Conrad Brandt, Benjamin I. Schwartz, John K. Fairbank: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Introduction, p. 13.

中国问题的理解和解说,说明了美国有影响学者对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内外政策和治国方略的看法,而这种了解无论对美国还是中国都是必要的,尽管都已成为历史。美国学术界认为这本著作代表了当时西方思想史专家和汉学家的水准,体现了这方面研究的具体进展,是西方学者对这段历史的看法和见证。^{〔1〕}关于意识形态,史华慈曾经说过,意识形态就是中国领导人的思想、学说和指导政策的目标,而这些思想和目标具有决定性意义。他的大半生都在关注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史华慈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共意识形态的研究,至少有两点意义:首先,他的研究是面向世界的,是从我们所无法企及的角度研究和介绍当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其二,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海外对中国意识形态的研究从来是认真的,他是身体力行研究中共意识形态的学者。

如果说,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史华慈对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考虑得较多的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战略和中苏关系前景;那么,60年代中叶开始,史华慈相当一部分注意力转向了对中国现代化和中美关系的思考。大概是在1966年初春,史华慈就较多地介入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思考。当时,美国政府在越南问题的处理上陷入僵局,全国反战声浪日高。史华慈的主张是:解决越南问题的背景是亚洲问题,亚洲问题的关键是中国,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并使中美关系正常化势所必然,而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也确实日益巨大。为此,他曾提出一些改善中美关系的重要建议。他认为应该增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各阶层人士的接触;他还指出,在亚洲既和中国友好又和美国有关系的重要国家应该是巴基斯坦。史华慈当时的建议引起美国国会以及有关咨询机构的重视。史华慈有关中美关系的很多文章就是在这样的特定背景下撰就的,与改善中美两个大国关系的进程紧密结合。像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美国,他都写过文章。他还与很多政界和学术界朋友探讨改善中美关系的问题。他是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首批成员。

为了推进中国问题的研究,史华慈还为进入中国进行实地访问和考察做积极努力的争取工作。在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界,他大概是最早进入中国实地访问的中国学家之一。还是在1975年夏,他就圆了这个访问华夏之梦。当时中美虽已建交,但中美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交流还不是十分方便。史华慈实现这一访问的路径也颇为曲折、富趣。1981年,他再次来中国,这次是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1〕 Edward Friedman: *Review: Communism and China: Ideology in Flux*,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8, No. 3 (May, 1969), pp. 616 - 617.

的邀请做专题访问的。史华慈每次到中国来总要走很多地方,随看随记。^{〔1〕}明清之际的顾炎武所谓匣书自随,了解山川利弊形势,史华慈作为异乡人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颇有此番情致。

史华慈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

中国思想史是史华慈中国问题研究的又一重要领域。他的代表作有《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年出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他还有《中国文化的价值》(China's Culture Value)一书,1985年由亚里桑那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他应邀到亚里桑那州立大学作的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演讲,题目分别是:“中国文化——东方的变化和历史的发展”、“中国文化和中国革命”,由田浩整理出版。田浩在序中说,这本书所设想的读者主要是广大的受教育者,而不仅仅是东亚研究的专家。尽管读者在阅读他的著作时要受到智力、道德方面的挑战,但仍然反响热烈。田浩强调这部中国思想史研究著作的国际视野,重申:“史华慈这两个学术报告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阐述”“卓具世界眼光。”此外,他还主编过《五四运动的思考》(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1972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史华慈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起步相当早,而不是一般所以为的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据笔者了解,还是在少年时代就读于拉丁学校时,他就表现出对思想史研究的兴趣。^{〔2〕}1938年他从哈佛大学毕业时,学士论文就是对法国学者帕斯卡尔的研究。^{〔3〕}二战胜利后,他一度到日本工作,他研究过日本的思想史和印度的佛教。所以1946年从日本回来重新上哈佛大学时,他的第一个志愿还是思想史。在费正清的影响下,他选择了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但即使这样,他还是坚持对中国思想史的关注和研究。比较早的例证是,1951年下半年,他在哈

〔1〕 史华慈第一次访问中国时,走访了北京、吉林、西安、长沙、上海、广州等地;第二次主要访问北京、上海、杭州、西安等,并作学术报告。

〔2〕 史华慈夫人对笔者回忆了这方面的情况,她说,史华慈在拉丁学校读书时,对语言的训练不感兴趣。他从小喜欢思考一些深刻的问题。

〔3〕 他的学士毕业论文题目:《帕斯卡尔和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家》。布莱兹·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 1623—1662)是法国17世纪著名数学家、物理学家、发明家、哲学家、散文家和宗教圣徒式人物。史华慈主要对他的人性、伦理和哲学思想进行探讨。

佛开设了近代中国思想史课程。从严复、林纾、梁启超、章太炎讲到陈独秀、胡适、蔡元培、鲁迅等思想家。这也许是美国较早有关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系列讲座。1957年,他撰成《中国思想史:初步的反思》,这是他对思想史的一次重要反思。^{〔1〕}1959年,撰写了一篇关于儒家思想的论文《儒家思想中的几个极点》,刊载于倪德卫、芮沃寿主编的《儒教在行动中》的专著中。这是美国中国思想研究委员会主办的学术会议论文集,撰写论文的学者还有列文森、倪德卫、狄百瑞等。论文显示了史华慈对儒家思想研究的浓厚兴趣和功力。所有这些努力,说明史华慈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由来已久。

史华慈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又一重要特点,就是他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是从对近代学者的研究切入的。第一个成功的作品就是《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这本著作揭示了严复在向中国介绍西方思想方面的成就和贡献。史华慈对严复的翻译工作审慎地解读,认为严复在认识西方近代化经验和向自己的祖国阐释方面做了有成效的工作,严复还分析了中国贫困衰落的原因。他甚至发现斯宾塞对自己思想内部的逻辑的理解有时还不如他的中文翻译者。史华慈向西方学界介绍了这位启蒙思想家探寻西方富强原因的艰辛努力。

为什么史华慈的思想史研究一开始是从近代人物做起的呢?他曾谈及这方面的想法。他说,至60年代,自己对历史兴趣的天平,正倾向于地区思想史,更多的是19世纪至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他说,严复是世纪之交西方思想的伟大传播者和翻译者。严复带着他的时代问题和对西方思想的想法,提出了很多重要问题。一直到共产党人获得政权,这些思想在中国的政治和知识分子中都有重大影响。^{〔2〕}他在向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提出课题申请时,阐述了这样的想法。他的这一研究目的显然是达到了。^{〔3〕}诚然,他当时实际上还强调了另一层深刻的思考,那就是出于比较研究的考虑。他写道,“哈佛的教学迫使我要关注现代日本历史的

〔1〕 Benjamin I. Schwartz: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a: Preliminary Reflection*, in John K. Fairbank (ed.),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2〕 1960 April 7, a letter of an application for research for Yen Fu, Harvard Archives, ACC# 14133, BOX3.

〔3〕 “The fascinating book is, in my opinion, a major contribution to modern Chinese studies.” From Earl Swisher, *Review: In Search of the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ume 71, Issue 2 (Jan., 1966), pp. 641 - 642. “Here is a notable contribution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Professor Schwartz’s study of Yen Fu and the West is much more than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of an important transitional figure.

研究,并且也已经导致我从比较的视角去看中国的发展,包括观察现代印度”。史华慈说,他试图用比较的方法探讨西方思想影响下的中国学术,包括日本、印度相应情况下的近代问题。希望通过这样的比较,沟通和阐述人类文化发展的共同思想经验。在史华慈看来,中西文化虽然不同质,但跨文化的理解是可能的。这本书完成后,路易斯·哈茨请纓作序。哈茨着重谈到,假如史华慈仅仅展示一块异国土地对一个人的明显影响,仅仅尽职地记录这种远距离的思想交流,“效果也许不会是这样”。他说,史华慈的这本书不是对“影响”的研究,而是“真正的”“比较史学的著作”。其所涉及的,“比我们原有的看法更宽更广”,“向西方思想中一些为人们熟悉的观点提出了挑战”。〔1〕这是史华慈对严复成功研究的很关键突破,实际上也是贯穿于他后半生学术道路的重要理念和方法。

如果说,史华慈一开始的思想史研究是从近代入手的,那么,接下来,史华慈的研究就开始向上下两头延伸。向现代延伸的这头是先出成果的,当然也相对简单,这就是他主编的《五四运动的思考》,是一个会议的论文集,着重于对现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思考。〔2〕史华慈对现代思想史研究的观点集中在他撰写的引言中。他认为,迄今为止还难以估量五四运动所产生的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学术意义。

不过,史华慈没有将这段思想史作为他研究的重点。他花大精力投入的是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是他一生中国学研究、思想史研究的闪光的顶点。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展示了他很多重要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方法。史华慈何以将自己的最后一步,放在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探讨上?这也要追溯到1965年的一个思想考虑,这是他的一个课题申请报告。史华慈说,在开了几年中国思想史课程后,越来越感兴趣于中国思想史探讨,并希望写一本总的关于中国思想史的阐释性专著。证实有这样的中国思想史,它是活跃变化、新颖而又影响社会发展的。〔3〕

〔1〕 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序言》,载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中文本,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2月。

〔2〕 参与撰写的作者和论文主要有史华慈《引言》、迈斯纳(Maurice Meisner)《五四运动中的批判旧文化、民族主义、国际主义》、林毓生《五四时期和中国自由主义前景中的激进的文化批判》、费侠莉(Charlotte Furth)《历史上的五四》、李欧梵《五四作家的罗曼蒂克》、默尔·戈德曼(Merle Goldman)的《白话运动的左翼批评》、杰姆·B·戈里德(Jerome B. Grieder)《五四时期中的政治问题》等。

〔3〕 1965, Dec. 15, a letter about his research for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Harvard Archives, ACC# 14133, BOX3.

史华慈这部著作大体实现了 20 年前拟定的方案。对早期周代思想、孔子、墨子、道家、孟子、荀子、法家、阴阳家等逐一研究。他的学生田浩对这本书的内容和特点有较实在的解说。^{〔1〕}他认为《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是史华慈几十年教授、思考中国思想以及它与当代西方社会、学科之间关系的结晶。史华慈不仅想说明中国古代思想与当代跨学科问题的关联,而且意欲彰显中国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和它的张力。他说,在史华慈看来,有的专家对中国文化的阐释和建立的范式,要么是掩饰了中国文化的内部张力,要么是简化了中西对比研究中的复杂性。史华慈从不将自己的评论当作对中国文化内部具有持续、共同的趋向的观点的全盘否认。

田浩十分了解自己的老师,他的简略阐述所蕴涵的意义是深刻的。至少,他强调了史华慈清理和研究古代中国思想的非凡努力,这种努力确实令很多中外的学者折服。正如《美国历史评论》的书评所说,这是一本经过多年研究、思考和反思的著作,所做的翻译和琢磨的工夫是巨大的。“是一个非常重要而有价值的研究,也将是我们以后研究和讨论的基础”,“它会继续发挥这样的作用,所有历史学家都将认真看待这本专著”。^{〔2〕}田浩所强调的中国文化的内部张力问题,找到了史华慈研究的一个要害处。史华慈在书的引言中就这样说,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们已摒弃了“西方冲击论”,他们不再认为在西方冲击来临之前,中国是沉默、静止和“无历史”的;中国“有创造性的”时期不是短暂的,“传统中国”后来的若干世纪内,“中国社会的每个方面都发生了内在变化的趋势”。作为史华慈的学生,田浩的阐述,还准确地强调了老师一贯的比较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史华慈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时,也确实重申了这一思路。《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引言着重说明:“当人们从整个文化取向的层面下降到问题情景的层面上时,跨文化的比较就会变得极其激动人心和富有启发性”,“真理往往存在于精细的差别之中,而不是存在于对 X 文化和 Y 文化的全球性概括之中。”^{〔3〕}

《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以其卓越的成果,获得美国亚洲协会列文森奖、美国历史学会詹姆斯·亨利·布里斯底特奖,以及爱默生奖等多项学术大奖。这都是美

〔1〕 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著、罗新慧译:《著名中国研究大师史华慈小传》,这是田浩纪念史华慈的一篇悼文。刊《开放时代》2001年5月号,《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2001年6月27日转载。

〔2〕 Robert B. Crawford; *Review: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ume 92, Issue 3 (Jun., 1987), p. 720.

〔3〕 Benjamin I. Schwartz,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1-2.